



美国空军史

李大伟
编著



目 录

美国空军的建立	1
美国空军的脱颖而出	27
美国空军的首次严峻考验	70

美国空军的建立

仅仅 50 年的时间，美国空军就从一个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仓促复员弄得支离破碎的庞然大物发展成了今日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军种。在这个过程中，它一面克服着观念、装备和人事方面屡屡出现的失败，一面取得了值得欢庆的成功。

使美国感到幸运的是，成功在数量上和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失败。在 90 年代，空军在取得海湾战争和冷战的非凡胜利方面如果不是起了主要作用的话，也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美国空军的每一个领导人，从部长、参谋长到中队长，都会不假思索地指出这些胜利是与陆军和海军共同取得的。不管三军在争地位、争任务、争拨款、争媒体报道和争公众支持方面闹得多么不可开交，战事一来，这些严重的争吵就都马上中止。在战后岁月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得十分成功的联合作战原则并不总是得到遵守，但在波斯湾战争中却体现得极好，令人钦佩不已。尽管如此，本书仍把重点放在美国空军上，虽然书中的许多论述也同样适用于它的姊妹军种。

空军尽管在国内外遇到了许多令人生畏的障碍，但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首要的和最直接的障碍是苏联空军。它富有才干、重点明确、战斗力强，而且发展了大量卓越的装备和运用这些装备的战略战术。苏联与其卫星国慷慨地共享自己的能力，而其中某些卫星国又注定要成为美国的凶猛对手。苏联的威胁是实在的、巨大的，而且似乎永无止境。起初被夸大的苏联核导弹能

力很快就发展得非常强大。现在，虽然苏联已不复存在，但由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瓜分的导弹力量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也许更具威胁性，因为对它的控制远不是万无一失。

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重大的障碍。首先，空军不仅总是要应付国会审批预算过程中的反复无常，而且要应付总是随着监督而来的越来越多的限制。所谓“监督”，其实是国会和行政部门事事都要深抓细管的一种委婉说法。其次，在将近 20 年的时间内，公众的支持由于憎恶越南战争而显著下降。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空军的成员们发现自己由于干了奉命去干的事情而公然挨骂。今天，虽然美国空军的声望基本上已经恢复，但在新闻界，在学术界，甚至令人吃惊地在政府内部，仍可发现潜藏着的反军情绪。

十分引入注目的是，空军即使在努力战胜诸如此类的各式各样挑战的情况下，依然创造和保持了一种为长远的未来进行筹划的奇特能力。空军对技术的依赖也许是飞行这门科学本身的内在要求。在对先进技术的信念方面，空军甚于陆军和海军，也甚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军队。空军从一开始就受到空军五星上将亨利·H·“幸运儿”阿诺德的鼓励，以后又受到历届空军参谋长的鼓励，不仅给研究工作提供经费，而且给予那些以研究技术为职业的军职和文职人员信任和机会。提供经费的工作并非总是始终如一，因为战时出于作战上的考虑必然要抽走一些研究经费。但是，研究和发展工作是空军继续获得成功的要素，这一基本思想始终未变。

空军尽管不遗余力地避免庞大官僚机构固有的特性和运作方法，然而它的规模和度过的岁月还是使它变成

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庞大的机构通常缺乏预见性，可是空军这些年来还是设法使其领导层和作战部队具备了预见未来装备和训练需求的能力。其非凡的成果就是：在所有军种都受到预算限制的情况下，空军既成功地应付了当前的危机，又进行了必要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以加速发展为未来冲突所必需的那些技术。

在 40 年的时间里，美国空军的主要任务曾是遏制苏联的进攻行动。它完成了这项任务，一是由于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空中力量的经验和方法同不断增大的核武器（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库结合了起来，二是由于空军在被违心地拉进太空时代之际趁机发明了数量惊人的新技术。

与此同时，美国空军还不得不应付其他的挑战。其中有些挑战的规模很大，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另一些挑战则威胁程度稍次，如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此外，美国空军还要在国内外从事救灾活动，以及访问外国和投送力量。而在这期间，它又一直不得不应付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多种多样，从取消军内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到克服老百姓在越战期间和越战之后对军队的厌恶，再到为妇女和少数民族人员提供均等的机会，应有尽有。

尽管空军的任务具有多面性，它还是胜利地完成了几乎全部任务，同时又一直遏制着苏联并对打赢冷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回首往事，冷战岁月似乎具有一成不变的特性——与苏联的对抗一成不变，而空军也是在用一成不变的手段来坚定地应付这种对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威胁的性质几乎年年在变，迫使空军所作的反应也发生相

应的变化。在最初的岁月里，当发生封锁柏林的事件时，空军的反应是虚声恫吓，对着庞大的苏军挥舞着几乎是空无一物的核武库。随着岁月的流逝，苏联通过其代理人在世界各地向美国挑战，每次都只有一点点自己的部队参与。例如，它打朝鲜战争用的是北朝鲜和中国的部队，辅之以自己提供的装备、训练和有限的人力。它用类似的方式支持了北越人，让别的国家为它流血。这种方式在中东、非洲、最终在古巴这样近的地方都使用过。由于苏联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插手一些国家的事务，美国为奉行由杜鲁门总统发起的遏制政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然而，尽管在朝鲜未分胜负，在越战中又遭到失败，遏制政策最终还是获得了成功。这些年来，作为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保护神和受益者，空军建立了强大的空中力量和导弹力量，把苏联大体上限定在雅尔塔协定划给它的势力范围之内。

苏联不仅受到了遏制，而且被拖得精疲力竭，因为其军事预算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消耗着它的力量。苏联在军事装备和太空探测上的成就，是用堪与美国媲美、甚至往往超过美国的投资获得的；从这种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来说，则尤其如此。这种巨大的开支是以牺牲苏联民用经济的合理发展为代价的。苏联的生产能力一心一意地用在军事上（其太空计划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因此无力发展在技术上和市场结构上与其西方宿敌或亚洲新兴国家并驾齐驱的工业基础。到 1980 年，苏联衰退的民用工业基础已经越来越难以承受沉重的军事负担，而 10 年之后则更是无法承受了。

在那个至关重要的 10 年里，美国所做的三件事促成

了苏联的垮台。第一件事是美国从 1980 年起逐步加强军备，扭转了卡特执政时期实力下降的现象。本已几乎衰竭的苏联经济由于要赶上美国加强军备的行动而紧张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

第二件事是罗纳德·里根总统的虽未最终完成但却使人眼花缭乱的“星球大战”计划。这项宏伟的计划显然是苏联无力攀比的，而美国可能获得成功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危险，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又大得难以想象。

第三件事，也是具有决定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武器在波斯湾战争中取得了势如破竹的胜利。隐形战斗机的无懈可击，以及精确制导武器惊人的军事和公共关系效应，使苏联的军政领导人完全失去了信心。由于其经济在 74 年的腐败和低效的重压下破产，苏联领导层终于被迫承认其制度已经失败，并且至少暂时放弃了主宰世界的历史性追求。就像墨索里尼腐朽的法西斯主义几乎一夜之间就消亡一样，苏联及其单一政党——共产党也在一夜之间消亡了，并且很快陷入了四分五裂、混乱和反责的可怕境地。

苏联大而空虚、充满工业和政治蠢事的衰败面目一下子暴露在世人们面前，于是干脆自行解体，让它的人民自行其是而不论后果好坏。它那在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方面均占压倒优势的庞大军队，顷刻之间从对世界生存的威胁变成了令人难堪的贫困中心，无力给士兵们提供膳食、装备和被服，有时连电费都付不起。

然而，打赢冷战只是美国空军在其头 50 年中所承担的任务的一部分。在每个 10 年里，都有需要空军作为从属于核威慑任务的“兼职”工作而予以应付的新挑战。有些挑战是内部的，诸如适应社会的变化、弥补装备的

不足以及年年力图以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另一些挑战则是外部的——从在朝鲜的沉痛经历，到在越南遭到的令人沮丧的极大创痛，再到使人振奋的波斯湾战争的胜利。

每一项挑战都是由空军的男女将士们在创造出另一项杰出业绩的同时予以战胜的。他们忍受着艰苦的、捉摸不定的军人生活，频繁的调动，较低的工资，以及往往不称心的工作岗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跨进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不折不扣地成了美国的缩影。按照旧的观念，军事基地是一个远离社会的、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惯例的自给自足的实体。这种旧观念已经消失了。美国空军人员日渐摆脱了多年来一直作为军队特征的边疆哨所的形象，而成为他们所在社区的活跃成员。他们有自己的家，也从事兼职工作，送子女们上学，纳税，而且已同邻居们打成一片，通常难以分辨谁是军人、谁是老百姓。

这种从怀有临时驻防思想的狭隘团体到成为美国社会基本组成部分的转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那就是连空军的成员们也很少察觉到这一变化，更不要说去谈论这种变化了。空军内外的人们仍趋于把空军当作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业单位。事实却是：空军人口的组成情况与整个美国人口的组成情况基本相同，因此也体现着美国平民大众的倾向、癖好、问题和潜力。

关于空军的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它是怎样提前 10 年或 20 年就预见到装备和武器方面的需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那些成就可以归因于空军有一个专业化的领导层，这些领导人所受的 20 年的训练都

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用当时的常规武器建立空中优势。战后的每一项成就也许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作战成就同样重要。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迅速而准确地实施了一些若未成功就会被视为浮夸的计划。有一些计划由于在构思、筹划和实施等方面都蔚为壮观而极其引人注目，其中包括：部署不是一种而是4种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建立覆盖整个大陆的雷达防御体系，以及为了遂行战争和达成其他军事目的而系统地开发航天潜能。

在这期间，除了一马当先地开辟通向冷战胜利的道路之外，空军还几乎马不停蹄地打了3场大的战争和两场小的战争，同时又在全国率先取消歧视而将少数民族和妇女融入军队。在同一时期内，它从针对一个超级大国的以核打击为主的力量，转变成了一支既能以常规武器对地区性冲突作出反应、又保持了决定性核能力的力量。

空军在作战行动和预见性方面一般总能获得成功，其原因何在？答案将在以后各章中披露。归根结底，空军的成功来自在恰当的时间拥有恰当的领导人才；不仅在军官这个层次上是如此，而且在士官层次上也是如此——这也许令人惊异，但却更为重要。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领导人才，是因为空军具有吸引优异之士服役的内在能力和精心营造的使能人得以青云直上的氛围。美国空军中的官兵关系很特殊。这种关系来自旧时形成的传统。在那个时候，军官驾驶员们知道自己的生命要靠担任地勤组长的士官们来保障，因此十分尊重他们。互敬互重是今日空军中的普遍现象，并在许多方面对空军获得的成功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不是说空军已经解决了所有的民主问题并且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然而，空军的组织体制向来允许真正的能人升到顶层，而不论其出身、学历和外貌如何。在过去的 35 年中，真正的能人越来越容易升到顶层，而不分种族；在过去的 20 年中，则连性别也不分了。在走向真正的机会均等方面，空军总是走在全国（包括其他军种）的前面，并从中获益匪浅。

有人说，以色列空军是在战斗中诞生的，因为它是在 1947 年的独立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可以毫不牵强附会地说，美国空军是在众多的战斗中诞生的，而且在其整个历史上一直在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战斗。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的思想首先是由比利·米切尔等人在本世纪 20 年代（过早地）提出来的，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发展。在那次战争中，亨利·H·阿诺德上将和卡尔·“图艾”·斯帕茨上将等领导人有时使作战上的考虑适于为战后空军的独立创造条件。这种思想在对日战争胜利之后军队因大批人员复员而造成的大崩溃中坚持了下来，并且经受住了美国海军不屈不挠的反对。但是，独立只不过意味着进行一系列新的战争。最容易应付的是实际的战争，如朝鲜、越南和海湾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敌人是明确的，需要采取的行动是军事行动。比这复杂得多的是争夺预算的战斗，与海军之间在公共关系上进行的战斗，以及空军的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膨胀所引发的内部紧张关系。

对于美国说来，幸运的是，天意和卓越的领导占了上风，美国空军在其每一次战斗中都获得了胜利，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学习和为迎接未来而未雨绸缪。

空军也犯过许多错误，其中有的微不足道，有的则

造成了严重后果。然而，空军所作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建立了美国强制下的和平。这不仅遏制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成了苏联磨灭自己的砂轮。

空军的成就是许多因素——人、领导、装备等等——的综合成果。然而，它获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致力于在作为超级大国象征的先进技术方面投入了并且将继续投入必要的研究与发展力量。

巧得很，也幸运得很，空军能力的发展符合了美国公众自越战以来提出的两项独特要求。第一项要求是，我们必须在部队伤亡最少的情况下遂行战争。美国再也不想打越战那样的战争了。在那次战争中，我们的部队被迫作战，而且伤亡过大。第二项要求是历史上罕见的，即我们还必须在给敌人造成最少伤亡的情况下打赢战争。

这些对任何国家说来都是高尚的要求也许是对冷战岁月作出反省后的反应。在冷战时代，苏联和美国的战略都是“相互确保摧毁”。它有一个恰当的缩略语“MAD”（“疯狂”）。按照这种相互威慑的理论，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双方都能给对方造成无法承受的毁伤。如果这种战略失灵，每一方的伤亡就会上千万或上亿；伤亡是上千万，还是上亿，要视发疯发多久而定。在冷战结束之前很久，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如果奏效，就可以防止全球核冲突，但对有限战争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因为有限战争的威胁性并未大到需要动用核武器的地步。越南战争使美国痛苦地看清了这一点。直到1972年12月，美国才下决心充分使用空中力量去对付北越。在这之前的8年冲突中，美国遭受了（也给对方造成了）沉重伤亡。在海湾取得的

胜利也使人看到了公众的新要求。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的伤亡尽管与作战规模相比微不足道，但仍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引人注目的是，公众对伊位克的伤亡，特别是平民的伤亡，也表示不满。其他一些事件——在海湾战争中己方火力误伤自己人、在索马里发生的悲惨屠杀、对于在波斯尼亚可能遭受损失的担心——都证实了美国公众的态度是必须在双方都尽量少流血的情况下进行战争。

这一要求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支军队曾被要求在双方只付出最小代价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幸运的是，美国空军由于执行了技术改进计划而破天荒地能够满足这一要求。此项计划历时已有 50 多年，可以一直追溯到一位起了推动作用的人物，他就是空军五星上将亨利·H·阿诺德。

“幸运儿”

在塑造现代美国空军的形象方面，有一位人士——亨利·哈利·阿诺德——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他在政治上耐心进行的艰苦准备工作确立了美国陆军上层对他的信任，并且博得了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青睐。阿诺德的经历在同事中赢得了深厚的友谊，但也招来了公开的憎恨，因为有些人不同意他的观点并且认为他太政治化、太容易妥协。

然而，正是阿诺德的灵活性为现代美国空军打下了基础，而且他那些拼命工作的部属也很少有人同意关于他太容易妥协的说法。他那始终无所不在的旺盛精力鼓舞着部属，帮助他们，使卷入历史上最伟大战争之中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表现超出了人们的一切期望。也许最为重要的是，阿诺德心甘情愿地背离自己的强项和过去

的经历，让新独立的空军踏上了不断改革技术之路。他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但不是技术专家，所以并不充分理解自己所追求的变革。不过，他的直觉告诉他，这种变革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朋友们、公众和报界都亲昵地叫他“幸运儿阿诺德”，自由世界则十分感激他。

阿诺德从西点军校的一名普通学员起步，最后成了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空军五星上将。在升到顶层的曲折历程中，他曾是飞行先驱，然后又放弃了飞行；他在1917年成了美国最年轻的上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匆匆忙忙的裁军中于1920年降回到上尉。由于努力工作、富有魅力和颇为机灵，他在1938年9月29日升为少将，成了航空兵的首脑。那时，阿诺德指挥着一支拥有大约23000名官兵（其中只有2500名等级驾驶员）和1200架作战飞机（大多陈旧过时）的航空兵。已有35年军龄、退休在即的阿诺德，必然既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满意，又为他所指挥的航空力量极其糟糕的状况深感沮丧。这支航空力量在飞机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落在了世界上所有大国的后面。

然而，战争迫在眉睫，并带来了他想象不到的变化。仅仅7年之后，虽然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他像自己所崇拜的偶像约翰·J·潘兴将军那样成了五星上将，并且指挥着240多万人的部队和由7万架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更重要的是，当他精心指挥空中力量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区取得空中胜利的时候，他完全证实了空中力量先知比利·米切尔当初的主张是正确的。

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包括自己的健康——都投入了这项努力之中，并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前很久就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去实现建立一支独立空军的梦想。

阿诺德得到了他所信任的同事们的倾力相助。这些人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像他一样，牺牲自我，在薪金微薄、没有声望、飞行员死亡率高，而且时刻充满危险的航空兵中服务。卡尔·斯帕茨、艾拉·C·埃克、约瑟夫·J·麦克纳尼、劳伦斯·S·库特、乔治·C·肯尼、劳里斯·诺斯塔德、霍伊特·范登堡等将官所提供的帮助，以及负责航空事务的助理陆军部长罗伯特·A·洛维特及其后任斯图尔特·赛明顿等文官所提供的帮助，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不失时机地策划这项活动的则是阿诺德。

阿诺德深感选择时机的重要性，以致在战争初期就指派麦克纳尼少将去领导一个委员会，其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前压住要求成立一支独立空军的浪潮。诸如此类的事情使阿诺德在那些要求空军立即独立的袍泽们眼中掉了价。但是，阿诺德在战争期间高高兴兴地与陆军完全站在一起，以换取陆军在战后支持空军独立。

他所进行的巧妙的准备工作对日后美国空军的特征产生了持久的巨大影响，因为正是阿诺德——一位有远见的实干家而不是科学家——使空军坚定地走上了研究与发展之路。而且，也正是阿诺德，以一种神秘莫测的方式创造了利于及早发现未来必不可少的领导人才的气氛。从阿诺德时代到现在，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情况之外，空军总是能够预见到需要加以满足的不断变化的要求，在恰当的时刻从基层提拔恰当的领导人才。在马歇尔的鼓励下，阿诺德亲自启动了这一选拔进程，在战争初期就挑选年轻军官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又在战争快要胜利结束时，采取措施让这些年轻人在战后空军中先于资深军官获得晋升机会。这对初生的美国空军说来是有益的，

但对某些资深军官说来却是最后的致命一击。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就没有站在阿诺德的阵营里。他们像阿诺德一样经历过战前可怕的消沉时代，薪金低微，又得不到晋升。在战争中，他们肯定认为自己已经效率极高地履行了新的战时职责，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阿诺德肯定会解除他们的职务。可是，在建立独立空军的梦想就要成真之际，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被忽略了，只分配到一些没有出路的职位，甚至被客客气气地要求退役。这使阿诺德很痛苦，但是这正是他准备付出的代价和正在形成的传统。

阿诺德为确保空军独立而作的谨慎的全面准备，不像他指挥作战时的那种风风火火的作风。这些准备工作揭示了阿诺德才智的广度和深度，从而超出了一心只想完成任务而不问政治的鲁莽飞行员的传统形象。他的计划本身就是一件杰作，而阿诺德在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航空部队并领导它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时仍能执行这项计划，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位面带微笑的银发将军在作出这种努力时运用了机智、外交手腕和公关才能，而毁谤他的人则对此嗤之以鼻。然而，他赢得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这样的大人物的信任、好感和赞助。这倒不是因为他具有上述那些才能，而是因为他不负所望。阿诺德的美国陆军航空队表现得非常出色，而他也亲自保证了这支部队毫不动摇地忠于陆军和献身于打赢战争。他从不允许自己为建立独立空军而进行的间接游说活动干扰坚决遂行的战事。这是一种致胜的策略，因为到了1943年，他已经在陆军、国会和行政部门中营造了使他在战后得以实现其梦想的气候。

“幸运儿”这个爱称远比他的管理风格更符合他的社会身份。他特别上照，而他那和蔼、自信的风度又使他能够在社会交往中与人们相处得很好。满脸堆笑和热烈握手在推销空中力量方面都能起到很大作用。他在战时大量的巡回旅行中不断地微笑和握手，而这种频频出行则对他的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

对他来说，工作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阿诺德相信自己知道能用空中力量完成什么伟业，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陆军航空队存在的多方面的缺陷。他干劲十足，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决不让自己或任何为他工作的人闲下来。1940年，他面临的任務似乎艰巨得不可能完成，因为航空兵什么都缺，包括飞机、驾驶员、地勤人员和基地。没有训练基地，每年只能训练不到一千名驾驶员，而实际需求是10万名。现代空军需要几千种技术人材，从厨师和面包师到领航员和雷达观察员都包括在内。但是，用于训练这些技术人材的正规骨干则根本没有。工业基础也同样不足，尽管战前同盟国通过采购飞机给予了一点帮助。美国的飞机设计师们仍在按照战前飞机设计师指导手册所载的几乎是幼稚的规格设计飞机，轻率地忽视了欧洲空战每天都在告诉人们的经验教训，那就是装甲、自封式油箱和其他战斗必需品都很有价值。他克服了每一个困难，其方法有时是亲自动手，例如制定庞大的民间驾驶员训练计划；有时是鼓动别人去干，例如劝使制造商们在合同还没有到手的情况下就拿钱去冒险；有时则是让人心存畏惧，例如宣布要去拜访一位懈怠的下级。

阿诺德太急躁，难以成为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他动辄就给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有时是为数不多的头一

批人——委以重任，而不管他们的权威性、专业知识或能力如何。他要立竿见影，不接受为拖延或失败所找的任何借口。人们在沮丧之余戏谑地称他为“从陆军中性情最平和的人里面挑出来的人——总爱发火的人”。

对于美国的战争努力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一点是，阿诺德有一个显著的特性，而且每次发挥这个特性时都使他付出沉重的代价。与外国空军（很奇怪地还包括德国空军）的许多指挥官不同，他不让私人交情干扰对其下级的评价。他所在的航空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规模很小，因此不仅他的朋友和同事，而且他的对头，都获得了高位。然而，不管是密友还是对头，阿诺德都一视同仁。他很少给予赞扬。但是，一旦某人表现得不如阿诺德所期望的那样，他就会毫不怜悯地解除此人的职务。他认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王牌飞行员弗兰克·奥德里斯科尔·亨特准将未能有效地发挥其第8战斗机司令部的作用，于是坚持要撤换此人。连他长期的密友、战前与他合写过许多航空书籍的艾拉·C·埃克少将也不能幸免。阿诺德觉得埃克没有发挥其轰炸机部队的最大潜力，于是把他从第8航空队的指挥职位上撤了下来。这伤透了埃克的心，因为他创建了第8航空队，并引导它走到了几乎已能完成任务的地步。阿诺德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他的心脏不堪重负而且已经出了麻烦，而埃克解职一事更增加了他心脏的负担。尽管如此，他还是以职业上的坚强决心迎接每一次挑战。这种决心成了空军将领们心态的样板。

有资格急躁

阿诺德有资格急躁，因为他在长期服役中已经付出了很多。他于1911年同奥维尔和威尔伯·莱特一道在俄